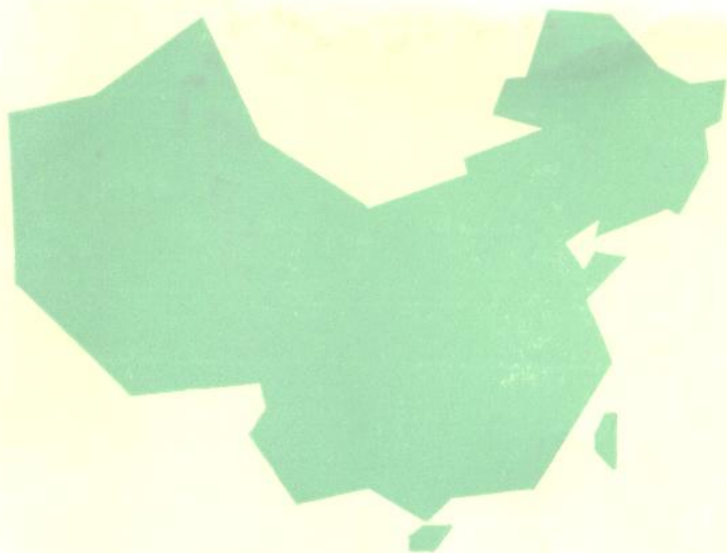




十年改革大事记

(1978—1987)

新华出版社

D 40/

十年改革大事记

(1978—1987)

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室 编

十年改革大事记

(1978—1987)

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室 编

•

新华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插页2张 318,000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200册

ISBN7-5011-0252-X/D·41 定价：4.10元

0130/26

前 言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建国以来国家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

本书以大事记的形式，记录1978——1987年十年的光辉历程，着重反映改革在实践上的成就和理论上的发展，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和稳定性，改革的艰巨性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从而为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并帮助广大读者提高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贯彻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根据这条路线提出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的自觉性。

大事记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客观记述。

书中完全根据国内出版的公开材料编写，以新华通讯社的报

道为主，兼采其他报纸、书刊的材料。每个条目后面括号内注明资料来源，凡只写日期而不标明报纸、书刊名称的，都是采自《新华社新闻稿》。一般说，凡比较重大的报道，各地报纸和《新华社新闻稿》登载的时间大致相同。

全书分关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教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几部分，各部分再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冯婉蓁、陈廷旺、李晓建、姚延彬；由李雄藩主编，赵华胄编审。

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室

1987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关于改革·····	(1)
-----------	-----

政治体制改革

概述·····	(33)
党政机构改革·····	(38)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61)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76)
干部制度改革·····	(94)
军队体制改革·····	(112)

经济体制改革

概述·····	(122)
城市综合改革·····	(150)
建筑业和基本建设体制改革、房地产业体制改革·····	(164)
劳动工资制度改革·····	(179)
工业体制改革·····	(185)
交通运输、邮电体制改革·····	(210)
农业体制改革概述·····	(221)

农业生产责任制	(247)
专业户	(256)
合作经济	(258)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	(263)
乡镇企业	(269)
林业	(273)
畜牧业	(279)
水产业	(281)
农垦	(282)
水利	(286)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287)
金融体制改革	(297)
价格体系改革	(307)
商业体制改革	(314)
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	(334)

文教、科技、卫生、体育体制改革

文化艺术体制改革	(347)
教育体制改革	(353)
科学技术体制改革	(381)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403)
体育体制改革	(4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改革

关于改革

1978年10月11日 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时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经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组织措施。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邓小平文选》）

1978年12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

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

1978年12月18日——12月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22日通过的会议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他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 and 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12·24）

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

1979年10月30日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辞时说：“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

义民主和完备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

1980年12月16日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陈云文选》）

1981年7月17日 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谈话，他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1957年一般右派言论的错误程度。象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1957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

的。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邓小平文选》）

1982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讲话时说，“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如果到本世纪末，还有18年，每一天都会在斗争。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是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

1982年9月1日 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有系统地完成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犯罪活动，必须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这四件大事，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9·8）

1983年4月29日 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

央代表团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3年7月8日 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利用外国的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办教育，搞技术改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3年10月12日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他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理论和文艺战线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

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6月22日 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大陆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6月30日 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说：“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我们要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10月22日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说：“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30年到50年达到，打慢一点，算50年吧，50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

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们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当然没有什么发展还有其他因素，有我们的错误。不开放不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11月1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也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5年1月1日 赵紫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讲话。他说，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重大改革。我们对这场改革的方向和决心，要坚定不移，要有必胜的信心；改革的步骤、方法，要谨慎从事，务求必胜。他说，今年是执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一年，对全面改革来说是一场初战。古今中外不少有经验的战略家都遵循一条原则，就是：慎重初战。要务求必胜，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慎重初战，不是不迈步，而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准备、有把握地迈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一步。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年进行改革的方针。（1.2）

1985年4月15日 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时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5年5月20日 邓小平同陈鼓应教授谈话时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国家拿一部分，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用来搞教育，搞科学，也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5年9月23日 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他说：“改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提出来了。改革从农村开始”，“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

“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6年9月28日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

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9.29)

1986年12月12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是改革的重要方面。他说，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效果，但还不够理想。权力下放，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说，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旧的习惯势力大得很。公开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遇到实际就会涉及一些人的利益，这时赞成改革的人也会成为改革的障碍。他说，改革总要遇到障碍，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他说，中国古代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目前的改革可能不止“过五关”。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不仅我们这一代而且下一代都要搞改革。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改革有个头绪。我个人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

(12.13)

1986年12月30日 邓小平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7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扩大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全党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努力圆满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任务。（1.17）

1987年2月18日 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说，“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